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

〔苏〕若莱斯·A·麦德维杰夫

〔英〕安德鲁·R·德肯 译

邵子婴 宋 嘉 译

赵 洵 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



2 024 2419 9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苏〕伊·A·戈德兹瓦夫
〔苏〕普列特·A·瓦西里耶夫
〔苏〕瓦西里耶夫·K·德·译
王学勤 译
王学勤 译

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

〔苏〕若莱斯·A·麦德维杰夫

〔英〕安德鲁·R·德肯 译

邹子婴 宋嘉 译

赵 洵 校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印张 130,000字 2插图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600册

书号：11091·66 定价：0.67元

出版说明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序	(1)
前 言	(5)
第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	(9)
过多的接班人	(10)
清除贝利亚	(14)
第二章 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	(20)
第三章 农业改革	(30)
第四章 西方的挑战	(42)
对国家保安部的改组	(43)
一点小小的成绩	(46)
第五章 权力之争	(50)
第六章 农业“奇迹”	(59)
新边疆——处女地	(60)

	种植玉米运动	(64)
第七章	赫鲁晓夫占了上风	(67)
	“秘密报告”	(67)
	事件后果	(71)
	1957年的戏剧性事件	(75)
第八章	赫鲁晓夫操之过急	(81)
	机械——拖拉机站——事与愿违的结果	(85)
第九章	梁赞州的惨败	(93)
第十章	苏美制度的联姻	(100)
	对工业的震动	(101)
	国民经济委员会	(102)
	效果	(103)
	对科研机构的改革	(105)
	对农业的震动	(106)
	农业部的命运	(108)
	“从柏油马路到田地”	(110)
第十一章	“农业奇迹”乌云笼罩	(113)
	开垦处女地的胜利成了问题	(113)
	玉米运动的后果	(118)
	玉米作为青贮饲料	(119)
	玉米作为粮食作物	(121)
第十二章	赫鲁晓夫身边的人物	(123)
	T · D · 李森科	(124)
	M · A · 奥尔尚斯基	(129)
	A · S · 谢甫钦柯	(129)
	V · S · 列别杰夫	(131)

A·阿朱别依	(133)
第十三章 引起政治危机的“改革”	(135)
第十四章 失败的苦涩	(149)
形势确实使赫鲁晓夫很难堪	(150)
更多的烦恼	(151)
对休耕地的错误处理	(153)
首当其冲的肥料问题	(155)
对赫鲁晓夫的补救措施的反应	(157)
第十五章 赫鲁晓夫下台	(160)
第十六章 在赫鲁晓夫之后	(168)

序

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是苏联进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充满矛盾，而且毕竟是有限的，但在实际上，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无不受到1953年至1964年这段时期变革的影响：大恐怖的结束，千百万监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获释，为限制一些最恶劣的官僚习气和特权所采取的措施；公众的觉醒，知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以及导致我们今天所谈的“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个常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的过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远不只是它的发生没有引起长时间的暴力或动乱和往往出人意料这两点。

许多研究苏联问题的西方学者，对这些事件的发生缺乏准备，因而理解得也迟缓。他们被斯大林二十五年的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及其强加给社会和官场的畏惧、尊奉、僵化的形象所束

缚，也被他们自己头脑中固定不变的“极权主义”的苏联模式所禁锢，感到难以想像任何重大、持久的变化。他们否认或者看不到，在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当权的整个时期内，这种变化已经发生，而且进行改革确是赫鲁晓夫的本意。赫鲁晓夫从俄国上层进行改革的传统出发，把自己看作是（也正如某些人评论的那样）“好皇帝”尼基塔。不少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赫鲁晓夫反复无常的改良主义进程所迷惑，把他的政策解释为仅仅是为了“权力之争”——这通常被看作是苏联政治的唯一实质——而搞的权术。还有一些人，甚至在赫鲁晓夫1964年10月被迫下台前夕，还拒不承认他一直是一个极力奋斗的领袖，这位领袖的政策在苏联官僚机构内部，以至在他的最高层的同僚中，都遭到了激烈反对。

1964年以来，以及1971年赫鲁晓夫逝世之后，西方专家和苏联公众对赫鲁晓夫的看法的分歧点，转移到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及其遗留的影响问题。一种也许是对赫鲁晓夫较为有利的观点正在慢慢形成。但是由于我们的注意力某种程度上仍然集中在苏联制度中继续存在的独裁主义的一面，致使赫鲁晓夫实行改革的全貌至今仍被习惯势力掩盖着。这种情况，还在妨碍着尽管有许多弱点和过失的赫鲁晓夫，受到他在历史上应该享有的尊重。

罗伊与若莱斯·麦德维杰夫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赫鲁晓夫的时代，或者重新考虑对这个时代的评价，有着重要意义。它出色地概括叙述了使得赫鲁晓夫获得权力，成为苏联领导人，继而失势的主要事件与问题，内容丰富，分析性强，富于洞察力。即便是可能不同意麦德维杰夫兄弟的这一或那一论点的读者，也会赞赏他们对于从非斯大林化的早期阶段，到赫鲁晓夫的狂热，及最终灾难性的农业和党内改革，这一系列关键事

件的明晰的阐述与新颖的见解。本书中明确论及的一些重要政治问题，并没有与赫鲁晓夫的生涯一起结束。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又遇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发生分歧，就象以后的领导还会面临这种情况一样。

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它看待和分析问题的独特的角度。正如若莱斯·麦德维杰夫指出的，赫鲁晓夫时代对于作者来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他们的著作是第一部由苏联作家“从内部”所作的广泛的分析研究。出自这两位苏联作家之口的“活着的历史”一语，决非文字上的渲染、修饰。作为三十年代斯大林恐怖时期的一个受害者的后代，苏联知识分子阶层的活跃的代言人和社会主义的革新派，（罗伊本人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与赫鲁晓夫的政策利害关系，是社会性的，也是与己唇齿相关的，赫鲁晓夫倒台之后，他们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个人的卷入使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非常有趣，但我认为并没有因此而歪曲事实本身，尽管他们自己也有过“希望与幻灭，……热情与痛苦”，麦德维杰夫兄弟还是对赫鲁晓夫做出了在我看来是公正、恰当的评价。他们对他的错误的批评是严厉的，同时提出“他还有不少值得赞誉之处”。

当然，罗伊和若莱斯·麦德维杰夫的观点，不能代表苏联所有知识分子或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的众多的不同见解，也不可能由哪一个人来代表。尽管如此，我以为他们的看法仍然颇具代表性。将来，有关赫鲁晓夫时代的著作会更多起来，目前在苏联，仅仅是地下刊物上有所评述。^①麦德维杰夫兄弟关于

① 由一些当事人撰写的专题性见证材料已经开始出现，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关于文学政治的回忆录《小牛撞橡树》（1975年巴黎版），和弗拉基米尔·拉斯克金的《索尔仁尼琴、特瓦尔多夫斯基与新世界》，《二十世纪》杂志第二期151—218页，由罗伊·A·麦德维杰夫编辑（1977年伦敦版）。

赫鲁晓夫的“积极作用”的观点，一定能经得起考验而站住脚。而且可能时间愈久，材料愈多，愈会得到证实。同时我们深知，在大多数社会中，影响深远的改革往往要经历数十年漫长的历程，一点一滴，困难重重，时进时退；而且在改良的进程得以重新开始之前，一般总先有保守势力的反攻，正象赫鲁晓夫之后在苏联发生的情况。以“一半是失败了，因而也就有另一半是成功”这种较长远的政治眼光看来，诸如赫鲁晓夫这样的伟大的革新者们，只有在当他们的经历成为历史以后，才能得到我们的充分的理解与尊敬。

斯蒂芬·科恩

前 言

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是作者从1963年起，经过长时间的持续努力写成的，中途曾有过间断。那时，赫鲁晓夫刚愎自用，地实行计划不周而又风险极大的农业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苏联在它的历史上，也是在整个俄国的历史上，破天荒的开始从国外购买粮食。^①

我之所以对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是由我对苏联遗传学争论的历史所做的研究引起的。关于这个研究，我写了《T·D·李森科的兴衰》一书。至于本书的合著者，我的兄弟罗伊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分析，则是他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自然延续。这本书，是他研究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一个成果。罗伊和我还在1964年至1971年在莫斯科流传的地下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的文章。

我们对赫鲁晓夫的研究，在1971年被暂时地，然而粗暴

① “俄国”自然指的是1917年以前，苏联则是十月革命后的国家组织。

地打断了。那年十月，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得知《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不久将在美国问世，便搜查了罗伊的住所。他的全部有关斯大林的研究资料都被没收，还没收了他所有的关于赫鲁晓夫的笔记和材料。甚至连从苏联报刊上收集的剪报也未幸免。尽管如此，以在《政治日记》上发表过的文章为基础，1972年我们得以又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

1974年本书完成，其中的政治性章节，是我在伦敦撰写的。

我对本书的出版负完全的责任。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罗伊仍在苏联法律的约束之下。他在行动上很受限制，也缺乏像我这样旅居苏联境外的人所具有的、与西方出版界联系的自由（我是由于被剥夺了苏联护照和国籍而被迫流亡的）。书检审查使我不可能将手稿寄回国内，让罗伊看到本书的全文，也无法就出版前书刊评论者建议的某些修改征得他的同意。

在西方，有关赫鲁晓夫的文献作品屡见不鲜，还有几种版本的传记。而在苏联，不仅见不到关于他的书籍，就连他的名字在1964年以后也从报刊上消失了。只是1971年，苏联报纸发了一条很短的消息，公布他的死讯。即使是地下刊物上，也没有关于他的专题文章，或为他而写的回忆录。这个刊物对于斯大林时代的注意和研究，远远超过了赫鲁晓夫时期，在罗伊和我分别撰写有关斯大林和李森科的那两本书时，我们手头备有大量的回忆录，评论文章及其他材料。而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以后。关于他的材料就少的可怜了，事实上，本书是第一部由苏联作家写的关于赫鲁晓夫的书，也是以亲身体察过他的改革的人的目光，“从内部”来分析赫鲁晓夫的改革和政策的首次尝试。

西方在1971年和1974年先后出版的赫鲁晓夫两卷集回忆录，对我们从事研究的参考价值并不大。因为他的回忆录，主

要讨论的是国际问题。在论述个人生平和政治生涯时，没有提供文件依据。对他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许多错误，也没有做自我批评的分析。他还回避了对其农业政策的探讨，而这，正是本书的中心议题。

西方人所写的，为数颇多的有关赫鲁晓夫的著作，提供了大量饶有趣味的史实材料。但这些毕竟是“来自外部”旁观者的分析，是那些往往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写的学术论文。

而对罗伊和我来说，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至今仍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我们怀着希望与幻灭参与了这个时代的生活，有过热情，也有痛苦。我们曾为他大胆的政治、外交方面的变革而欢欣鼓舞，也曾为他在简单处理经济、农业以及理论问题上所不时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无知而愤激。仔细回味这些往事是很令人痛心的：赫鲁晓夫在有了那样一个辉煌的起点之后，该能为苏联和世界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而结果，他的作用发挥的极其有限，并且在突如其来的事变中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个突变，是1963、1964年发展起来的危机的必然结果。在本书中，我们力图作为亲自在苏联境内生活过的人所感受的那样，描绘出赫鲁晓夫时期的环境、气氛。

我们并不打算写一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全面传记，也不想叙述赫鲁晓夫时代的全部历史。在这段刚刚流逝而去的时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已经在多种书刊中得到了探讨。其中一个贡献卓著者，正是赫鲁晓夫本人。他除了回忆录之外，还发表了若干卷讲话稿，包括国际问题、农业问题和其他内容，例如关于“文学艺术的责任”的讲话等等。所有这些文本，以及按照他的指示所做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许多变动，生动鲜明地展现了他的频繁的活动，展现了他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取得的切实

的成果，和他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对苏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所以，我们不想重复，哪怕仅仅是简短地重述他所做、或是在他掌权时期所发生的一切。

要说明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升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曾经达到过的高度（即个人具有指挥一切对内对外政策，改变党的纲领、章程，任命或罢免政治人选和提出并通过新法的种种权力），并不困难——历史学家们不难对他擢升给予解释和评价；然而要解释他的出乎世界各国意料之外，引起了巨大震动的下台，就是对历史学家的严重挑战了。在苏联，人们认为他的下台只是时间问题，因而没有过份的震动就接受了这一事实。赫鲁晓夫的演变，从1953年至1957年的小心谨慎，有条不紊的革新者（要记住，那时他还处在顽固、保守的反对派的遏制之下），到攫取了全部权力之后，仍然成了激烈的研究课题。当然，在1957年以后，赫鲁晓夫确实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而且假如他1964年以后仍然当权，也许还能做得更多。但必须正观的是，从1958年至1964年期间的许多计划和运动造成的恶果，至今仍在苏联发生影响。

在地下刊物最活跃的时期（1962—1966年），苏联作家还可以使他们的批评性著作的原稿，在本国知识界中自由传阅，由此得到一些新的原始材料和有益的评论。现在，这种“内部”传阅手稿的有利环境已不复存在。因此，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们希望这部书将有助于搜集赫鲁晓夫有关国内政策方面尚无人知晓的，独特的新材料，也希望本书能为将来进一步探讨我们所思索的问题提供一个基础。

若莱斯·A·麦德维杰夫

一九七六年一月于伦敦

第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

在着手写这部书时，我们打算先把直接有关的背景描绘一下。以便为赫鲁晓夫和他执政的时代这幕戏搭起舞台。这个背景就是：斯大林留下的恐怖；他死后表面上有所克制而实际上毫不放松的权力斗争；以及赫鲁晓夫在农业和政治方面的试探性的改革，这些改革，很机敏微妙地适应了当时普通公民的愿望与要求。在这之后，我们就要转向本书的主题——赫鲁晓夫那些混乱的、破坏性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冲击，他将这一切无情地强加给了迷惑不解的人民。如果“太少、太慢”会导致一场战争的惨败，那么“太多、太快”同样可以给一个国家带来灾难。

我们列举的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不是重复一些谣传，而是来自一份尚未发表的、1964年10月以后在党内传阅的秘密文件，文件中历数了赫鲁晓夫的错误。但我们的分析，大部分还

是有独立见解的。我们不仅指出了赫鲁晓夫个人的缺点，而且指出了当时整个权力结构的缺陷，以及从斯大林时期延续下来的，在赫鲁晓夫手中只是略有改动的社会制度的弊病。

过多的接班人

1953年3月，约瑟夫·斯大林的死亡，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政治真空。在他活着的最后几年里，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包括最亲近的同事。由于一直害怕被推翻，他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1923年，列宁感到即将寿终时，曾以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一封信的形式留下遗嘱，对他身边的其他领导人做出了评价。可笑的是，他的关于将斯大林调离权力中心的这一主要意见，恰恰没有得到实施）。斯大林很少想他什么时候会死，甚至在死的前一天，他还在策划对一些政治要人进行一场新的、彻底的清洗。这之前，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核心小组——老政治局，已经被改组为由三十几个成员组成的、大一些的主席团，而其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尽管是暂时的，那时真正的权力是由副总理乔治·马林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拉弗林季·贝利亚，和他们一道的、一度曾任外交部长的弗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掌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主要是通过政府渠道，而不是通过党的机构来行使其专制权力的。他的主要身份，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被削弱，总书记一职改为第